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规划教材

传播学系列

跨文化传播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lobal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孙英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

跨文化传播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lobal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孙英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传播学/孙英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

(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规划教材·传播学系列)

ISBN 978-7-301-25526-1

I. ①跨… II. ①孙… III. ①文化传播—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1743号

- 书 名** 跨文化传播学
著作责任者 孙英春 著
责任编辑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526-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9.5印张 530千字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绪论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追问”	1
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与研究视域	12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的定义与学科诞生	13
一、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	14
二、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18
第二节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基础	23
一、人类学的影响	24
二、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启示	27
三、符号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贡献	32
四、哲学与文化研究的经验	36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视域”	41
一、文化的特征与体系	41
二、传播的特征与功能	46
三、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	49
四、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全球场域”	54
第二章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方法论	61
第一节 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	62
一、文化传播与文化差异理论	63
二、有关有效传播及认同的协商与管理理论	66
三、聚焦于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	70
四、跨文化调整与适应理论	72
第二节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举例	78
一、民族志:田野工作与文本写作	79
二、跨文化比较	85
三、话语分析	88
四、扎根理论	94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98
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	99
二、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辨	103
第三章 传播中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	108
第一节 符号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109
一、符号与符号学	110
二、索绪尔、皮尔斯、巴特、卡西尔的符号思想	114
第二节 传播中的语言符号	120
一、语言与文化	120
二、语言与传播	127
第三节 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	133
一、非语言符号的功能	134
二、身体语的组成	136
三、沉默的意义	141
四、文化中的时间	144
五、文化中的空间	149
六、服饰与颜色	153
第四章 差异与冲突:基于文化的观念与规范体系	158
第一节 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	160
一、针对文化差异的理论主张	160
二、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164
三、人际冲突与文化冲突	168
第二节 文化的观念体系	172
一、世界观的差异	173
二、价值观的中西差异	177
价值观差异的四个维度	178
个人主义在西方的演进	181
东西传统中的集体主义	183
价值观的变动	186
第三节 文化的规范体系	188
一、习俗与禁忌	189
二、礼仪与道德	192

三、宗教	199
四、制度与法律	206
第五章 社会互动与认同的建构	211
第一节 社会互动与人际关系的文化差异	213
一、社会互动、社会化与符号互动主义	213
二、文化群体与社会分层	217
三、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222
参考群体与意见领袖	225
创新的扩散	226
四、人际关系理论与中西传统	228
人际需要 VS. 社会交换	228
个人本位 VS. 群体取向	231
第二节 认同的定义与建构	235
一、认同: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235
认同的特征	236
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237
二、社会性别的角色与认同	241
第三节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245
一、文化认同的稳定与流变	246
二、民族、族群及其认同建构	250
民族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	254
族群认同与认同发展研究	259
移民、族裔散居与跨界族群	262
三、国家认同的定位	266
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268
国家认同的危机与思路	270
第六章 文化的认知体系与文化心理研究“路线图”	274
第一节 认知的基础:感知与思维方式	276
一、影响感知的文化因素	276
二、思维方式的中西差异	280
三、国民性格:文化群体的“平均人格”	286

第二节 态度的两种类型	290
一、态度的定义与功能	291
二、定势与偏见	293
定势	294
偏见	297
归因理论	300
第三节 面对本土场域的文化心理研究知识谱系	302
一、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互动	303
二、从跨文化心理学到文化心理学	306
三、本土心理学的兴起	310
第七章 文化适应、传播能力与技术的影响	314
第一节 文化休克与文化适应	315
一、文化休克与“返回本文化休克”	316
二、文化适应、文化涵化与文化同化	319
个体与群体的文化适应	321
文化涵化与文化同化	323
第二节 传播能力与组织的实践	327
一、传播能力与跨文化传播能力	327
二、对话与倾听:一种理想模式	334
三、组织的跨文化传播	341
组织与组织传播研究	342
跨文化培训	345
跨文化谈判	347
跨文化广告	349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的技术空间	350
一、技术的社会影响与文化本质	351
关于技术发展的文化差异	354
跨国传媒的文化影响	356
二、新媒体传播与虚拟社会	357
三、“数字鸿沟”与网络伦理	360
第八章 文化多样性、文化对话与文化现代化的当代选择	366
第一节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相对主义	367
一、文化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政策	367

二、文化相对主义:从学术话语到共有观念	374
文化中心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	376
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	379
第二节 文化对话、文化合作与“文化共同体”	381
一、文化对话、文化合作与文化遗产保护	382
二、中韩日文化传统的同质性	386
三、面向未来的“东北亚文化共同体”	393
第三节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本土的“焦虑”与选择	398
一、传统与现代性	399
现代化理论的转向	399
传统与中国	402
二、本土与全球社会	407
文化“同质化”?	408
文化现代化的观念与制度安排	411
第九章 文化权力、国家形象与全球伦理	414
第一节 文化的权力关系与后殖民主义话语	416
一、文化的权力关系与秩序	416
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当代意义	418
文化霸权与“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	421
文化外交及对软实力理论的“反思”	424
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场”	429
从萨义德到霍米·巴巴	431
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	435
第二节 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	439
一、中国形象的衍变	439
二、文化形象的定位	444
三、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	447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空间	451
一、走向全球伦理	451
二、全球伦理的三个层次	455
三、本土文化的伦理主张	458
后记	463

绪论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追问”

人文社会科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能力,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和时代。

在迅速变迁的全球社会中,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不孤立,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离不开对全球与本地语境的比照,需要立足于时代和现实关怀,培育开阔、综合的视域,去理解居于本土的自身和所处的世界。对置身于不同文化和国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为了应对人类全球化交往积累的种种压力,把握本土和外部文化的复杂构造与彼此交结,呼应本土及全球社会的变迁,自应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方面做出具有实质性的努力,以激发在本土被忽略的种种话语、被压抑的种种期待。

学术研究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通常是指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从本土的视角修正其局限,为寻求科学解释本土现实和解决本土问题,走向一种具备“本土契合性”的学术范式的努力。^①自近代至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理论、方法乃至认识论大都建立在西方知识系统之上,非西方的自我表达被长期压抑、排斥,有关非西方社会文化的知识生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由西方经验全面掌控。站在非西方的立场,要超越这一局面,必须重新思考“平移”西方学术的“不得已”抑或“时髦”的做法,加强差异性研究,突出研究者所居本土的独特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基于这一认识,一个时期以来,作为后发展国家知识界为改变学术话语与知识生产机制不平衡状态的集体反思,学术研究的“本土化”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相关的讨论也日渐深入。

^① 根据杨国枢的观点,“本土契合性”是指研究者的思想观点、知识体系和研究行为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和行为之间达到一种“契合”状态,这也是衡量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标准之一。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有关“本土化”的思考,有必要体会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提示,“我们必须认识和理解文化过程”,“我们需要更多的有关文化参与者自身的具体知识”^①,也需要借鉴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和相关主张。这里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区别于所谓西方“普遍知识”的知识形态,并不特指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也不否定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观念:知识的效力与地域有关,与知识生成的情境有关,与由特定文化、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以及利益关系决定的立场和视域有关。近年来,“地方性知识”在后发展国家知识界引发的广泛讨论,也反映了不同领域对于看待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体反思:对知识的考察不仅应关注普遍准则,还应着眼于知识生成的具体情境。正如格尔茨所说,生活本身“只是一种人类活动,你应该去做出一种人性的判断并接受人本身的局限性”^②。世界原本丰富与多元,亦有大量稳定、历史悠久的“地方性知识”。它们各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不同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即使是在近百年来由西方知识体系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知识对本土的各种实践也在发挥效力,同时也证明在其天然具备的“本土契合性”中,内含着外来的“普遍知识”无法替代的解释、调节等种种潜在的能量。

适时展开跨文化传播的本土研究,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要求决定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从整体上关涉人类文化与传播的知识系统,自始以现实的文化世界和对人类生活的观察为基础,其学术旨趣就在于:揭示各种地方性的、独特的、微妙的文化现象或机制,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行动、行动者所处情境及行动与情境之间的意义关联。在不同文化中检验理论和获取新鲜的经验,原是这一学科的基本特点和专长所在。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兴起已深刻影响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传统,各个文化、族群、本土社区和国家社会的本质属性都在发生变动,不同的人文学科都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扩展各自的知识边界,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观念、理论、方法乃至研究框架的重建。关于这一点,庄孔韶的观点值得深思: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都有一个积累性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指通向内容更为丰富、广博的人类认知,“是对地球上人类各族群与区域社会文化的一览无余,以对人类心物构成之深掘为目的,为此,对人类自身的综观需要无尽的面与

① [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点的考察积累与良好整合”^①。

20世纪90年代前后,跨文化传播学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陆续在外语教学、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经济管理等领域展开。不过,虽经历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前沿的跟踪与研究不够,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与相互借鉴不够,学术旨趣、研究目标多样而不稳定,观念和方法歧异甚多,学科理论框架乃至实践途径等方面亦在探索之中。此外,与国内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仿,因受学术“行政化”趋势的影响,整体研究呈“碎片化”状态,多数研究缺乏彼此间对话的基础,更无在重大问题上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争鸣”的能力。特别是,缺乏科学的、富有成效的本土研究,照搬西方理论而忽视其本土适用性的现象大量存在,进而也就导致了具有批判意识和实践指向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缺乏。甚至如刘阳所说:“为数甚少的理论研究,大都为介绍国外研究范式或是直接将欧美理论本地化移植的生硬之作,鲜见聚焦于本土文化实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②如此种种,不止影响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学术自治地位,也难为当下中国社会日益复杂的文化与传播实践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总之,面对全球场域和复杂的本土现实,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亟待学术自主性的觉醒,我们期待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把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现实需要反映在研究活动中,提升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

根据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权力是多形态的,渗透到社会的不同领域,重要的是,知识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手段,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③。进一步说,知识和权力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权力产生知识,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针对文化与传播相关领域中西方学术话语的“绝对权威”,一些后发展国家的研究者已经体认到,这些话语以某种难以觉察的方式掩盖既存的东西方权力关系,被支配者亦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平等、不均衡的话语权力结构,以及这些话语预设的“陷阱”。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术话语的“权威”往往是以压抑和忽略后发展国家的文化经验和理论传统为代价的,非西方国家的

① 庄孔韶:《“蝗虫”法与“鼯鼠”法》,《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② 刘阳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了2000—2009年国内学者发表的1070篇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论文。其中,依据欧美理论/范式研究的论文为103篇(引用传播学理论的35篇、语言学理论29篇、心理学理论17篇、文化研究学派理论22篇),运用本土化理论的论文只有3篇,余者皆为一般性研究与思辨文章。参见刘阳:《我国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

③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知识精英被长期压抑而处于无言或失语的困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别人表述。自然而然地,本土学术传承中关于本土社会的研究积累,也被长期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其后果就是:既没有理解西方社会的能力,也缺失理解本土社会的能力。正如李金铨所说,西方知识“由中心扩散到边陲,由已发展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西方扩散到东方”,通过制约“从者”的核心信念及预设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或视之为当然,“一旦‘从者’把信念或预设内化甚至制度化以后,则强化了知识上的依赖,再也无法产生有意识的反省、抵抗或挑战”^①。在严重失衡的国际学术格局中,后发展国家的研究者不得不接受西方知识系统设置的种种标准和学术门槛,这极大地抑制了他们自身进行学术生产、创新和确信的能力,即便努力勤勉,也难有提供独特学术贡献的可能。

当前,传播全球化深入扩展了中外知识系统广泛交流的空间,也向中国知识界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学术自觉”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学术话语格局的中心位置。对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这一要求涉及一系列自立和寻求学术话语权的问题,包括:如何进行学术活动中的概念与命题陈述、理论阐述,话语和文本等能否被认可、接受,以及如何适应“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规则、体制等。这一领域自身建设的脆弱,还使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从国内学术格局的边陲走向中心?如何从国际学术格局的边陲走向中心?

今天的中国已走上了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内、对外的跨文化传播都在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作为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文化大国,无疑应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国际学术舞台上据有相应的重要位置;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文化交往、文明对话以及寻求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更突出了建设具有本土特色、本土适用性的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尤其是,近年来围绕中国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实践,出现了许多需要由这一领域直接做出回答的重大议题,而针对这些议题发出的学术话语,既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与中国社会寻求国际话语权的努力直接相关。

二

跨文化传播研究所涉的议题已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延伸,对外传播和对外交往的外部实践也为本土意识的培育提供了绝好的场地,并使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由此而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追问”必须呼应文化和

^① 李金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社会的复杂事实与变动,通过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逐步完成全球视域与本土场景的融合,逐步建立与本土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具有更新能力的思考框架和知识系统。^①

这些努力应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侧重。

第一,坚持跨文化传播学“先天”具有的多学科对话的特点和开放视域,对相邻学科的知识和新成果继续做出有价值的“知识整合”,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社会发展的知识需求,逐步完善一种观察、理解和表述本土、西方及其他文化的知识框架。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研究一直汇聚着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思考和经验,夯实了成为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门重要“显学”的基础。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人文社会学科构成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也持续作出独特的贡献。跨文化传播理论范式的最终形成,也有赖于对这些学科中不同的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重塑和形构的“知识整合”活动。这就意味着要把一个个零散的“飞地”汇聚成内容相对连贯、交融的“科学共同体”,以多元、多维的学术话语归纳、阐释相关学科有关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做到系统了解、批判吸收、兼收并蓄。

开展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还有一个益处:通过参照而非互斥,持续更新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发展心智和学术眼光,从而较为清醒地面对种种不成熟的、轻率的理论主张。事实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面临同样的努力,即强化彼此之间包括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之间话语和经验的共享。譬如,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域,有助于不同文化中的历史研究拓宽理解历史的文化视野,阻止人们先入为主地接纳“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解释——这些解释往往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不间断地制造着误读与偏见。

第二,鉴于西方学界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主导性贡献,应对西方学术经验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审慎考察西方理论和方法在本土场景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的同时,继续做好移植、引介这些学术成就的工作。

通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人文社科不同领域涌现出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成果,主要是通过应用西方理论的假定、假设、概念来分析中国的事实、研究中国的问题,既验证了西方理论的效度和信度,也为各自领域本土知识体系的形成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由此看待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本土研究取向,首先要尊

^①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场域与本土追问》,《浙江学刊》2010年第3期。

重学术传统,而不是追求“知识革命”;要尊重学科本源和研究规范,而不是闭门造车、坐井观天。更何况,与其他相对成熟的学科相比,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基础工作还未完成,创建本土理论乃至理论体系的时机也远未成熟。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仍需要继续深化对西方知识系统相关理论主张的认识,学术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范畴、理论、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仍要充分借鉴西方经验和规范。当然,面对全球社会的万千变相,西方的知识系统也正面临诸多无力解释的“异状”(anamoly),各种理论主张也面临着如何在变动不居的场景中发挥效用的问题。故此,移植、引进的工作,离不开对西方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理论自身的逻辑保持“自觉”,应尽可能考虑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和事实,进行恰当的调整、改造和补充。

针对西方理论与本土事实的关系,中根千枝曾做出重要的思考:社会科学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学术,引进它是很自然的,“但是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历史和民族与西欧的情况显著不同的其他社会时,它和在西欧社会运用的情况不同,很自然地会出现二者不能充分符合的问题。当然,在经过抽象化得出的理论和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之间是会看到不少差异。这些理论不会像在西欧社会那样照旧适用。更何况社会本身是动态的,一时确定的模型,不用说也肯定要经常加以修改”。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中根千枝认为,关键在于关注理论和现实的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的实际状况,也即两者的差异有质的不同,其差异本身是表现在远离问题核心的边缘部分呢,还是表现在问题的实质部分”,最终,需要验证它对本土现实社会的现象、本土民众“所具有的形形色色的行动方式、想法和价值观等是否正确和有效(validity)”^①。这也是一种为西方知识的对象化“确定语境”的工作,意味着对西方相关理论学说的阐释、评估和检验,应充分考虑其文化限定性,以及本土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事实上,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领域,在不同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原本就是跨文化传播学在全球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为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对这些理论的性质、功能和意义做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同时应强调,在引介和借鉴外部学术资源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某种“平衡”——既关注美国,也要关注其他西方国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还要关注和借鉴非西方国家学术传统和当代实践中产生的观念与知识,包括新的范畴和术语,以及对新的文化现象和经验的解释,等等。

第三,“问题意识”是跨文化传播学在不同文化中得到发展的内在动力,通

^① [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4、11页。

过本土“问题”来结合本土社会文化的特质、现实和选择,是对西方理论进行验证、调整和补充的主要途径,也是发展本土理论的必要前提。

知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对某些特定问题提供的解释。针对不同问题的学术努力,会产生不同的知识形式;对问题本身的体察,也意味着对自身知识来源和状态的反思,包括对自身知识特质和局限的觉悟。基于这一理解,本书关于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的理论与框架的探讨,必然要围绕这一领域的基本问题而展开——这些问题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假设或范式所指涉的,针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走向。正如单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建言:研究者应面对跨文化传播的难题和可质疑的问题,提出可讨论、争辩的对象性问题,这些讨论可围绕“文化与传播、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他者的意义”等基本理论命题展开,“只有在实践中辨析这些问题,才能发现跨文化传播的可能路径”^①。

学术研究的问题由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现实和变动趋势具体地决定,通过基于社会文化的实践和学术系统的过滤,逐步产生意义并汇入不同的知识系统。关于问题的意义,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理论发展和新理论的产生源自问题,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催生原创理论的问题必然处于特定的环境,即所谓的“问题情境”(problem situation);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原有理论和客观现实之间出现不吻合状态——任何理论都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旦发现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新的理论就可能产生。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西方学术面对的问题大都根植于西方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甚至于利益需求,其中有些在中国同样是重要问题,有些则必然不是。就此而言,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异质特征,以及本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求,恰恰是能够用以丰富、完善跨文化传播知识系统的重要资源。尤其是,中国在对外交往、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正不断遭遇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西方学术既有的知识系统并不能提供较为充分的解释和合理的策略。从这些问题出发展开探寻,意味着新的学术进步和创新的契机,也意味着研究者应立足于更为扎实的工作,有勇气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项“基因”研究。^②

第四,基于本土经验和资料的独特性,努力还原和验证被淡化、边缘化的本土知识及其价值,寻求一种有益于解释本土问题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

①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1期。

② 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

知识作为文化的产物,与特定的社会结构有关,并受特定社会结构的影响而表现出相对性。数十年前,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曾提醒西方学界,运用在“简单社会”中发展的理论去面对中国时应十分谨慎,因为中国社会是“复杂的文明社会”。他还指出,西方文化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当成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文化形态,学术研究应当指向非西方文化中“当地的生活实践中陶冶出来的合理做法”。事实上,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的学术研究也体现了那个时代西方学者中鲜见的“对非西方人文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作用的尊重”。费孝通对此深有体会,并就此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①他还向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不仅要开展科学研究,也要开展价值评价,不仅要研究客观性,也要研究主观性,特别是要研究中国社会特有的精神世界、交往方式,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使本土经验资料不仅有可能成为检验既有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也可能成为新理论的学术源泉。分析中国这样一个内涵广博、历史悠久、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如果简单导入西方的观念和框架来寻求科学解释,必易导致错误结论。这也是不同人文社科领域共同面临的难题:复杂的中国社会、文化和多样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可否用西方的学术范式来解说?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到底有何理论升华的意义?对于基于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来说,这种知识需求及其呼唤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决定了当下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努力方向。根据其他学科“本土化”的既有经验,要展开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需要具备一种从本土生活出发的学术态度,包括注意发现不同领域的中国学者用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渊源于学术传统的非西方概念对中国问题的提问与回答,在与本土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关联的议题讨论中,捕捉、厘清和吸收那些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不曾出现的中国思想,将之“填充”到本土研究的学术框架之中。借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主张来说,这种“填充”是对西方知识系统进行“改写”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作为一种争取话语权力的文化策略,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批判方面获取合法性的必要努力。

当然,对各种本土学术思想和成果的甄别、选择十分重要。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所涉的许多议题上,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话语和取向差异甚多,研究者需要本着科学精神,以及时代赋予的文化解释的多元观念,对这些话语给予同等的尊

^①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重,同时,应有能力进行审慎的鉴别,敢于破除和修正其中的偏见和谬误。

三

任何一个学科的思考、言说和行动,都离不开研究者对本土和世界的关怀。

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不仅是跨文化传播这一“问题领域”的思想属性的样式、精神能力的表现,还是一种自我意识,意指研究者在学习和思考中的警觉和体悟,即既要本土视域去看待世界的构成以及本土与之的互动,还要把诸多思潮和流派整合到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中,使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科学、理性的界面上交流、碰撞。换言之,既要立足于中国地方性的文化经验,也要体现人类知识系统对跨文化传播基本命题的多种解释。对于这一努力的途径,李金铨的思考颇为深刻:由分疏本土经验的内在理路开始,“不断上升抽象阶梯,以至于与相关文献互动,或参考之,或诘难之,最后既要充分诠释层层在地经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更要辩证地建立既具有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视野’”,也即是说,要“以世界主义的开放心灵,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彼此渗透,相互滋长”^①。

作为呈现人类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系统,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学科构建的基础,跨文化传播的主题、话语、概念、理论乃至范式,都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的考察。^②只有把跨文化传播置于人们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交往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研究,才能把握它的规律与变化。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框架,也必然是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对不同文化、人群、个体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反映、陈述或阐释。本着这一理解,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语境,从跨文化传播涉及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总体图景出发,按照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做出研究框架的设计,围绕跨文化传播学的基础概念、基本命题、主要理论、研究方法等,努力展现一种理解跨文化传播实践、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系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尝试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功能和意义做出基于本土视角的定位,为开拓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一种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

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未形成成熟、完整的学科体系,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因这一事实,该领域仍保有理论开放和思想灵活的巨大空间,需要大力鼓励自由、

^① 李金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②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讨论。